

毛泽东为何屡谈王蒙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

崔建飞



王蒙

毛泽东一生爱读、爱谈文学，他的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水准也很高。但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，毛泽东鲜少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小说作品。特别是短篇小说，除了对王蒙的短篇小说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大加谈论之外，我们还没发现毛泽东在重要会议上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公开评说其他任何一篇当代短篇小说。长篇小说有，如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，还谈过他的散文《愚泉吃茶记》；散文诗有，如流沙河《草木篇》；但也不及对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谈得那样多。毛泽东谈中国文学，给人大致的印象是：古典小说中，他谈得比较多的是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其次有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；现代小说中，他谈得比较多的是鲁迅，谈到过《阿Q正传》等，谈他的杂文、旧体诗更多一些，当然还有全面的评介；而当代小说中，毛泽东谈得比较多的，则是王蒙和他的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了。谈曹雪芹，是在作家盖棺之后。鲁迅谈得差不多。而毛泽东谈王蒙的时候，王蒙才二十二岁，发表作品尚不到八千字，是毛泽东时代一个副处级基层团干部，一位刚露尖尖角的青年作家。而如今，王蒙已盛名遐迩，年逾古稀，发表作品一万余万字了。

毛泽东对王蒙和他的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，不是一般地谈，而是大加评说，这么说的根据有五：一是谈的次数比较多，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，他先后谈了至少五次。二是谈得非常密集，这五次谈话的时间，集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五七年四月的两个月时间内。三是谈得语气很重，震动感情，有一次还对小说的修改者，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秦兆阳“大为震怒”。四是不就是就事论事、就文学作品谈文学作品，而是把它与重大政治举措和重大文艺方针结合起来谈。五是谈话的场合有的规格相当之高，甚为郑重，譬如二月份

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(扩大)会议，譬如三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，这两个会议都因其重要性而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史册。

王蒙的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是这样一个当代文学的特殊现象，不由得引起我们的关注。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？毛泽东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场合多次谈论它的？都谈了些什么？毛泽东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？这情有独钟说明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一现象发生在王蒙身上？让我们试着搞清它。

先看一反官僚主义的问题。

一九五六年，新中国成立到了第七个年头。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、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巨大、新生的革命政权站稳脚跟之后，治国信心增强、心境逐渐从容的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，开始考虑从革命到建设转变后的一系列建国方针和建党举措。首先当然是治党，这是法宝。这年九月，中国共产党召开“八大”，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辞说：“思想上的主观主义、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，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、脱离实际的，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，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、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。”以反对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为目标的全党新一

次的整风运动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始酝酿，并于次年五月一日正式发动的。无巧不成书，“反官僚主义”的王蒙小说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也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发表，真可谓恰逢其时。

一九五六年下半年，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，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官僚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忧虑、越来越重视。六月二十八日，波兰波兹南市发生罢工、游行示威和骚乱。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，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发生罢工、游行示威和骚乱。中央对这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发生的事情，异乎寻常地关注，十月下旬连续开了若干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往往都是在深夜召开，有的是在凌晨一时左右召开，可见会议之紧急，关注之严重。中国一些地区也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。从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三月的半年时间内，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、请愿事件，有数十个城市发生大、中学校学生罢课、请愿事件，在农村也连续发生闹社风潮。毛泽东在分析匈牙利党的错误时，把“官僚主义”放在头一条。毛泽东在分析国内闹事原因时说：“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犯了错误。犯错误的原由无非是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这些东西。”刘少奇也说：“人民群众起来闹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。”毛泽东这样称赞昆明航空工业学校妥善处理学生请愿事件：“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。如果办学校的人，都照这个办法办，那就好了。”

反官僚主义，既然成了毛泽东治党治国战略的最急迫、最重要的任务之一，那么，他对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的好感，和对“围攻”这篇小说者的反感，特别是对他不承认北京有官僚主义的说的反感，便是自然的了。

再看一看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问题。

也是在一九五六年，毛泽东

等中央领导积长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六年多的执政经验，充分认识到和平建国和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不同，必须更广泛地吸收、团结、依靠和加紧培养知识分子。否则很难缩短和发达国家科技水平上的差距，很难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力强大。毛泽东在国际问题上，有两个思想状态值得注意。一个是他超英赶美的强国理想，一直很强烈；一个是他对苏联斯大林的大准香花、不准“毒草”的“单干户”型知识分子政策颇多反思，很不以为然，这也是他当时对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评论之一。

于是一九五六年一月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，全面系统地宣布了与苏联颇不相同的知识分子政策。周恩来总理的主题报告激动了知识分子的心。这个报告的关键之处，是周恩来强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“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，这就从政治上把知识分子看作了自家人。会议还对提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高度关注。北京师范大学校长、历史学家陈垣满面春风地说：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。数学家谷超豪、哲学家冯友兰都表达了极为兴奋的心情。会议之后，知识分子精神振奋，学术活动开始活跃，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之为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”。到了四月春更浓。是月二十八日，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：“艺术上的百花齐放，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，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。”五月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讲话，对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进行公开详尽的阐述和发挥。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称号得很重视，毛泽东的关心，特别是精神上的解放，两手抓得都是过硬的。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以这两个文学性很强、颇富诗情画

意、音韵优美的词汇，来表达执政党的科学文艺方针，与领袖毛泽东的个性有关，也很对中国文人的胃口。“百花齐放”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春景，“百家争鸣”原指春秋战国时期，儒、道、墨等各种思想流派著书立说、互相论战、自由发表意见并形成各种学术的繁荣情形。毛泽东把这个两个词组在一起，充满了中国气派和中国古典审美情趣，比欧洲“文艺复兴”那个词更好听好看、更抒情，因而更有鼓动力。到了九月，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被庄重地写入了“八大”文件，这更促进了中国知识界激情的空前高涨。《人民文学》在这个激情高涨的金色九月，放飞了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这只燕子，开出了这样一朵奇葩。《人民文学》真不愧中国当时最权威的文学杂志，它的政治嗅觉和艺术胆识就是不同凡响！

毛泽东当然知道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、到信任、到尊重、到依靠，再到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这样一个在某些党政干部看来，简直是对知识分子过于宽容、过于厚爱的方针，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。对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的巨大争议，便是文艺界的一个典型案例。

毛泽东一向善于抓住典型问题、分析典型问题，解剖麻雀并推广之的。毛泽东为捍卫他所倡导的“放”的方针，站在护花的立场上，一再保护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等作品，一再批评与“双百方针”不和谐的声音。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座谈会说：“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，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。”一部年轻人写的短篇小说，能导致一个全国性的会议的召开，王蒙和他的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，闹出了多么大的动静啊！

摘自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一书附录 花城出版社

天，有两个鄂温克族猎民来京，托我将一份“报告”转呈中央，解决他们狩猎中急需的子弹问题。

我想来想去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带两位少数民族兄弟去向朴老求助。朴老欣然答应帮忙，写了一封信附在“报告”上，转达给了当时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同志。乌兰夫在“报告”上作了批示，并请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同志和国家体委协助解决。没过多久，将近二十万发小口径枪子弹便运往了大兴安岭原始森林。

在与朴老的交往中，我打扰最多的是：受人之托，代求墨宝。一九七八年，朴老刚从国外访问归来，我便带着朋友去了朴老家中。朴老推掉了一些事，用了半天时间，为我的几个朋友写了字。回去的剧作家李云良小声问我：“你不请赵朴老写一幅？”我虽然很想要，但看朴老已经累了，忙摇摇头。朴老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，提高声音说：“国光，我们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。我得给你写——做个纪念吧！”说着，他展纸挥笔，抄录了自己的新作《题万松图》，遒劲有力，潇潇洒洒三百字，一气呵成。并用了平时很少用的“无尽意”印做起首章；压角章盖的是刻有朴老家乡安徽巢湖的朱文。

一九八四年春天，几个文友到我家做客，见墙上悬挂着朴老的墨宝，赞叹仰慕，亟望帮助求之；苦苦相托之下，我贸然地点了头，并给朴老写了一封信。很快，朴老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，信，给朴老了，说不能写这么多字，很难说。因为根据朴老的工作和身体情况，中央有关部门已有规定，朴老一般不再写长的文章或题较多的字……可没过多久，朴老叫我去取。当我看到朴老那疲惫的面容时，深感内疚。朴老像往常那样目光慈祥地看着我，宽宏地说：“国光，中央是有过规定，可你已经答应了同行，不能失信啊！”

打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替人向朴老求字了。但我自己一有事，只要找到朴老，他还是一如既往，有求必应。一九八五年，部队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按规定，入中国作协，必须有两三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做介绍人。这事，我和朴老一说，朴老当时特别高兴：“好哇！你拿着表，快到我老家来。”一到朴老家，朴老便在我的入会申请表上第一介绍人的地方，认真地写道：“黄国光同志敏而好学，勤奋创作，已有多部作品问世，我愿意介绍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赵朴初”当年十月，我便顺利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一九八七年，我转业到了中国作家协会，领导派我去筹建第一家像出版社。为题写公司的名字，我又一次去麻烦朴老。没两天，我去取时，秘书悄悄地告诉我，这次，朴老又破例了！因为凡有经营性质单位或公司名称，朴老一概不写了。整个北京城只有青云仪器厂、国华商场那么几家，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啦！

是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给朴老添了多少麻烦。可朴老的胸襟总像大海一样，任我这个水兵出身懵懵懂懂的人纵横驰骋。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古人尹知章的话：“大士不矜，谦而接物。”

可亲可敬又十分可爱的朴老，不正是这样的“大士”吗！



赵朴初

赵朴初先生琐忆

黄国光

后一个艺术精品——即脍炙人口的戏剧电影《花为媒》之后，舞台生命就此停止。从那些不计其数的广大观众到我母亲本人都未曾料到，新风霞从此从评剧舞台上消失了。那颗无比明亮、万人瞩目的艺术明星，从此再没有重登舞台。那时的母亲年仅三十八岁。

在艺术上，母亲是一位大胆的创造者，生活中的她却十分胆小怕事，尤其是在“文革”的日子里，遇到一点小事她就吓得提心吊胆，家里有人说话稍微高声一点，她就赶紧把窗户关上，连说莫要再讲，与舞台上的她判若两人。谈起这些，母亲会埋怨父亲：“都是你爸爸，他一年到头闹祸，你说我能不害怕？”而事实却是，父亲每闯一次祸，母亲就会出人意料地勇敢起来，去迎接又一次政治上的挑战！没有母亲的陪伴，父亲根本不会走过那漫长的荆棘之路。

后来，病魔袭击了母亲的身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惊呆了，母亲以后怎么办？

钟天地之灵秀的母亲，在病后的一天，兴致勃勃地拿起了笔，用她仍然灵活的右手开始写作和绘画，她占据了父亲经常写作的书桌，父亲不得不为她订做了一个更大的书桌。那是满屋子都是母亲的菠萝、荔枝、扶桑花、大寿桃，书桌上是她完成的稿件，一摞一摞——全都是对往事的记忆，无边无际的泉水般源源不断的记忆。那朴实无华、感人至深的笔触将人们带到了母亲内心深处的那个天地，看着她这一切，人们都笑了——母亲本来就是个画师，她当然会画；身为著名剧作家、散文家的妻子，长期耳濡目染，自然能写。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神奇力量支持着母亲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《新风霞回忆录》。当她的第四本书问世的时候，中国作家协会吸收她为会员，民间艺人写作之先例；著名画师“荣宝斋”的店里高悬着她的四尺巨幅牡丹；她和高先生的联合书画展，跃过大海在我国台湾和美国展出。母亲收到了比过去更多的观众来信，新风霞的名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被叫得更响亮。

摘自《吴霜在说》文化出版社

我的母亲新风霞

吴霜



三岁时的吴霜和母亲新风霞

在中国，新风霞是一个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的人物。过去，人们谈起这个名字时喜笑颜开；如今，人们谈起这个名字却悄然叹息；过去，这个名字曾经代表过美丽和青春；如今，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坚忍和忠贞。这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名字，名字的后面隐藏了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动人故事。这个名字，曾是我降生到人间之后所听到的第一个词汇，那是因为，我的母亲就是新风霞。

小时候的我，骄横、任性，不怕任何人，只怕妈妈。后来我明白，我的母亲是一个天才的演员。在人们的眼睛里，她是天空中无数闪光的群星中的一颗，她的美丽，她婉转的歌喉，她所创造的一个个迷人的舞台形象，使她成了观众心目中完美的化身。

我母亲的出身，至今是一个难解的谜。我的外祖父母，并不是母亲的亲生父母，两位老人对此讳莫如深，直到去世时仍然守口如瓶，因此连母亲自己也不知道真正的父母究竟是谁？她的来历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被卖的？走失的？被人拐带的？都无从得知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：她是随着一群孩子从苏州过来的，当时好像还不到三岁，这是母亲从养母家的堂姐处听来的。人常说：苏杭出美女。母亲是一位人所共知的美人儿：单从这一点看，这个出处似乎不会错。

当我刚开始结结巴巴地读书认字时，便会长时间地把头埋在像小山般的一扎扎观众来信当中，那都是写给母亲的信，可几乎全没启封，母亲没有时间去读那些信，拆读这些信成了我的乐趣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信件是来和母亲认识的，有说是她的母亲的，有说是她的哥哥的，有说是她的二姨的，还有说是她的侄子的，更有一些年轻的观众要认她做干妈干姐的，许多认真的信里能够列举出母亲身上的一些无人知晓的特征：眉毛里有颗痣啦，左脚腕上有块痣啦，神乎其神，令人瞪目。这些信件真是五花八门，无法一一列举，有时看得我头晕脑涨，直到被妈妈揪出去吃饭的时候还懵懵懂懂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于是，我会拉着母亲的衣襟问：“妈妈，这些人是你家的人吗？”“乖，我不知

意，便在一个机缘之下将身世异样，一南一北，一天一地的两个人拴在了一起，从此揭开了那使人荡气回肠的一幕。

当父亲一九四九年从香港回到北京时，正是意气风发、踌躇满志之时，遇到了年轻貌美、在评剧舞台上正当走红的女演员，两人几乎不用任何媒人拉线，互相倾慕，一拍即成。婚后几年中，母亲不但艺术技艺日臻成熟，而且是渐达顶峰，更逐步显示出她贤妻良母的温柔本色，为父亲接生三个生龙活虎的小儿女。母亲曾拿出一张年轻时的剧照给我看，那是以韩国传统故事为题材的《春香传》的剧照。剧照中的母亲穿着韩国妇女的大裙子，母亲告诉我：“你知道吗？那时候你藏在丈夫大衣口袋里，你已经和妈妈肚子里八个月了。”据说我生下的二哥也是在母亲演出后等不及卸装，便立即送到医院而出生。一个年终忙碌在舞台上的演员，能够不断提高艺术水准，光芒四射，而不忘为其夫家尽传宗接代之责，如此无私无畏，在演艺明星中实属难能可贵，因此父母亲的珠联璧合，个个夸奖，人人称道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最喜欢花，这最初印象似乎正是来源于父亲赴东北的三年之中，算来那是我记事前的年龄。我们的四合院里鲜花很多，五彩缤纷，我自认不出那些花的名字，但我清楚地记下了那绚丽多姿的色彩与芳香。母亲并不是每天都回家，后来她告诉我，那时仍很年轻的她，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宁可去剧院住集体宿舍，以免有人说闲话。只要她一回家，就会把长长的黑发用手帕一扎，忙碌于那满院的鲜花之中，或者是把我们兄妹三人打扮得干干净净，到北